

# 让革命文物在大思政课中“活”起来

——写在全国百馆百校百件纸质革命文物融入大思政课图集《真迹》出版发行之际

■ 王巍

指尖轻翻泛黄纸页，眼前渐显模糊字迹，沉淀着烽火岁月的革命历史便随之铺展。近日，由全国馆校合作联盟编纂的全国百馆百校百件纸质革命文物融入大思政课图集《真迹》正式出版发行。

作为以“纸质革命文物”为核心载体、以“思政育人”为根本目标的重要成果，《真迹》的出版为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开辟了全新路径。在这一意义非凡的节点，深入挖掘《真迹》的深层价值，体悟纸页间承载的信仰力量，探索革命文物融入课堂、浸润心灵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长远价值。

纸质文物作为革命历史最直接的“见证者”，有着不可替代的育人价值。与青铜器皿、革命旧址等文物不同，纸质革命文物以文字、图画为核心表达，将革命先辈的思想情感、奋斗历程凝固在一张张纸页之上。从李大钊振聋发聩的《狱中自述》手迹，到左权将军饱含深情的一封家书；从新四军政治部印发的抗战宣传单，到写有孔繁森“遗书”的笔记本，这些纸质文物既是历史事件的客观记录，更是革命精神的鲜活载体。它们身上的褶皱、泛黄的纸边、模糊的墨迹，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革命先辈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坚守信仰、砥砺前行的故事。

然而，长期以来，许多珍贵的纸质革命文物“藏在深闺人未识”。一方面，纸质文物保存难度大，对温度、湿度、光照等环境要求极高，多数博物馆为了保护文物，只能将其珍藏在库房中，偶尔在特展中短暂亮相，难以与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深度接触；另一方面，传统的文物展示方式多以“静态陈列+文字说明”为主，缺乏与思政课堂的有效衔接，青少年难以将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与自身的成长发展联系起来，文物的育人价值未能充分发挥。《真迹》图集的出版，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益尝试，它通过“百馆联动”的方式，将分散在全国各地博物馆的珍贵纸质革命文物汇集起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给广大师生，让“沉睡”的文物真正“活”了起来。

全国馆校合作联盟成立三年多来，已汇聚百余座革命场馆与百余所高校，“百馆百校”的命名即源于此。作为联盟资源的典型缩影，《真迹》图集虽仅精选其中22座(所)馆

(校)的收藏精华，却覆盖12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包括9个省(山东、江苏、青海等)、2个直辖市(北京、天津)和西藏自治区，兼具代表性与广泛的地域覆盖性。而支撑其成为大思政课优质载体的核心，正是“百馆百校百件”联动模式，这一模式通过资源整合、跨界协同与内容精选，实现了革命文物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

“百馆联动”打破地域壁垒，构建了优质文物资源的共享网络，为模式落地奠定资源基础。联盟的凝聚力让不同层级、不同地域的场馆实现同频共振，参与《真迹》编撰的既有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国家级重点场馆，也有各省市地方博物馆，更不乏特色鲜明的县级革命博物馆。这种多元主体参与的格局，使得精选出的102件纸质革命文物形成了完整的历史叙事链条，从辛亥革命的呐喊到抗日战争的烽火，从解放战争的征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探索，再到改革开放的浪潮，各历史阶段的精神印记皆有承载。文物类型更是丰富多元，涵盖宣言、书信、手稿、报刊、文件、题词等，每一件都经专家精心考证并附上详细解读，让尘封的历史可知可感，为思政教育提供了坚实的实物支撑。

“百校参与”搭建衔接桥梁，实现了文物资源与思政课堂的精准对接，破解了“两张皮”难题。联盟秉持“馆校合作育新人”的使命，推动多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学校全程深度参与图集编撰，既确保文物筛选符合历史事实的严谨性，又兼顾不同学段学生认知特点，让内容真正贴近课堂需求。例如，针对青少年价值观培育，选取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手稿、革命烈士书信等素材，引导学生感悟革命精神的内核；针对理论素养提升收录革命时期理论著作手稿、重要会议文件等内容，助力学生把握思想发展脉络。这种“需求导向”的协同编撰机制，让文物资源从“馆舍里的藏品”转化为“课堂上的教材”。

“百件精选”锁定育人核心，通过典型案例的精准挖掘，让思政教育更具感染力与说服力。102件文物并非简单堆砌，而是经过历史价值与教育价值的双重考量，每一件都是革命精神的具象化表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革命文物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

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真迹》中的每一份手稿都凝结着先辈的信仰，每一封书信都承载着家国情怀，每一份文件都镌刻着奋斗足迹。如，中共永新县委编印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明》，作为红军纪律教育的核心教材，它将抽象的革命准则转化为可感知的行动指南；也有承载先辈温情与担当的私人书信，如周恩来致戏剧家洪深的亲笔信，字里行间凝结着对进步文化人士的关怀。既有孕育革命理论创新的思想硕果，如恽代英为安徽省委第四师范学校及和含学会会刊撰写的文章，将马克思主义真义与青年教育实践深度融合，播撒下思想觉醒的种子；亦有记录群众抗争足迹的通俗印记，如南开大学“反饥饿、反内战”的大字报，作为席卷全国的爱国学生运动的鲜活见证，镌刻着普通民众以热血守护国家的赤诚。

《真迹》图集的出版，为大思政课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也创新了思政教育的教学方式。传统的思政课堂往往以理论讲授为主，内容抽象枯燥，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真迹》图集以纸质革命文物为切入点，将抽象的革命理论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历史实物和生动故事，让思政课堂变得鲜活生动。教师可以借助图集，开展“文物解读课”，引导学生通过分析文物的内容、形式、背景，探寻背后的历史故事和精神密码；开展“情景体验课”，让学生模拟革命先辈书写书信、编辑报刊的场景，感受他们的思想情感；开展“实践调研课”，组织学生走进当地博物馆，实地考察纸质革命文物，撰写调研报告，实现“课堂+博物馆”的立体化教学。这样的思政课堂，不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是以文物为媒介的情感交流和思想碰撞，让学生在感受历史温度的同时，自觉传承革命精神。

《真迹》图集的出版，不仅为思政课堂注入了可触可感的鲜活素材，更实现了思政教育从“理论灌输”到“精神浸润”的维度跃升。

思政教育的本质，从来不止于理论知识的传递，更在于将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与责任担当根植于青年心灵深处。而《真迹》图集中的每一件纸质革命文物，都是承载这份精神传承的“活教材”，它们以笔墨为证，将革命先辈的精神密码清晰镌刻，让思政教育有了温度、有了深度、有了力量。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狱中写下的三首诗词，字字浸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赤诚信仰。其中《卜算子·

咏梅》“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的绝唱，展现了瞿秋白虽身陷囹圄，仍坚信革命的春天终将降临的坚定信念，这份穿越生死的信念，恰是对青年学子最生动的信仰教育。毛泽东“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的亲笔复电，寥寥数语间，尽显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居功、不自傲的谦逊品格，更蕴藏着对民族复兴事业的深沉担当——这份将个人荣誉融入国家大业的境界，为爱国情怀作出了最真切的注解。

如果说信仰是精神的灯塔，那么牺牲奉献便是践行信仰的底色。巍巍《汉江南岸的日夜夜》手稿上，那些反复修改的笔迹仍带着战火硝烟的温度，这份写于1951年抗美援朝战场的手稿，真实记录了志愿军在天寒地冻、粮弹匮乏中坚守阵地的壮烈场景，让“为民族解放不惜牺牲”的崇高境界不再是抽象概念。当学生凝视这些带着涂改痕迹的手稿，便会真切理解“英雄”二字的千钧重量。这些文物所承载的精神，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始终保持对信仰的坚守和对理想的追求。

对于高校学生而言，《真迹》图集绝非简单的文物影像汇编，而是培育其理论自信与历史自信的鲜活教材和重要载体。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教师若能深挖图集中革命理论手稿、重要文献原件等珍贵资料的历史内涵，将其与课程理论体系有机融合，便能引导学生在具象化的历史场景中，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进脉络，深刻体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核心逻辑。例如，解读毛泽东亲笔书写“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及重要文化古迹”的电报手稿，教师可借此阐释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战略决战的关键阶段，仍将保护文化遗产与民生根基置于重要位置，这种超越军事胜负的历史远见，正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特质，能让学生更准确地把握党的战略智慧与价值追求；分析江南工委渡江前夕的指示信，让学生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胜利前夕，既具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又拥有统筹全局的治理智慧——这种对革命胜利与政权建设的双重考量，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辽沈战役中第三纵队绘制的

《锦州作战部署图》，则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战场实际的深度结合。这种直击要害的战略部署，正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抓主要矛盾”理论的生动实践；而刘瑞龙关于淮海战役后勤和支前的工作笔记，既印证了“人民战争”理论的正确性，更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的政治优势——这种植根于人民的力量，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真迹》图集的教学价值，在于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象的历史场景。这些带着油墨清香、战场硝烟的文物资料，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再是教科书上的文字表述，而是可感知的历史实践。在思政课教学中善用这类素材，能引导学生从历史细节中把握理论逻辑，从文物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最终将理论自信与历史自信内化为成长成才的思想根基。

在数字化时代，《真迹》图集的出版也为革命文物的数字化传播提供了有益借鉴。虽然图集以纸质形式出版，但其中的文物图片和解读内容可以转化为数字化资源，通过线上平台进行传播。例如，可以开发《真迹》图集的数字版，打造线上虚拟展厅，让更多无法亲临博物馆的人能够随时随地欣赏珍贵的纸质革命文物；可以制作文物解读的短视频，通过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传播，吸引青少年群体的关注；可以开发互动式教学软件，将图集内容与虚拟仿真技术结合，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与革命文物“零距离”接触。这种“纸质+数字”的传播模式，能够进一步扩大革命文物的影响力，让革命精神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传承和弘扬。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政教育承担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使命。《真迹》图集的出版发行，为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革命精神的传承弘扬提供了新的载体。那些纸页间的信仰，那些笔墨中的坚守，必将通过思政课堂的浸润，转化为青少年成长成才的精神动力，激励他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作者为中共聊城市委党校(聊城市行政学院)副校长、市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服务中心主任、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

## 东昌府城池的变迁

■ 刘洪山

高，不坚固，不抗风雨侵蚀，难抵御强敌。明朝初期，太祖实行“高筑墙、广积粮”的政策，在军事、交通要地建粮仓、筑城池。池，即护城河。洪武五年(1372年)，由守御东昌的平山卫指挥金事陈镛改建为砖城。土城存在了302年。

陈镛建的砖城是什么样？见到的最早文字记载，是此后152年嘉靖四年(1525年)李廷相写的《重修东昌府城记略》碑文，说陈镛始甃甃以砖石，城周七里多长，高三丈五尺，往上收束百分之十五。四门门额：东春熙、西清远、南正德、北宣威。城上眺远之楼二十七，楼卒宿舍四十八，前代所建绿云、望岳二楼都在。每门有水门、钓桥、潜洞、闔门。池深二丈，宽三丈，最宽处四丈。全系拓旧而新。

“拓旧而新”，就是在旧基础上拓建。砖城的格局应与土城基本相同。

又四十年后，于慎行为万历七年(1579年)建城撰写的《东昌府城重修碑》和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王汝训纂修的《东昌府志·建置志·城池》中说，知府莫与齐奉扶按檄重修。重修的城增建了五处护城神祠，城增高为三丈五尺，厚二丈；河水深减为七尺，宽增为十七丈；增建了高八尺、厚二丈的护城堤，延亘二十里(约1万米)。改了门额：东寅宾、南南薰、西纳日、北锁钥。附城为郭，郭外各为水门。

于慎行，当时兖州府东阿县人。时任礼部尚书，因奸臣擅权，迫害忠良，万历六年(1578年)“称病归隐”。于慎行在碑文中饱含激情，浓墨重彩从历史方面、周边环境方面论述这座城市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及建城的必要性。写出盛赞东昌的警世名句：“清源绾毂御漳，万货辐辏，江北一都会……乃登楼循堞旁眺四野，偃慢坝莽，平皋沃土，一瞰千里，河流以一衣带，浟湙浃瀼，旋流而出，贡艘鳞次，牙樯蔽日，锦帆绛天，则叹曰：‘壮哉！此非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城而不完，保障云何？’”于

是建了“长桥虹跨，高楼聳拱”，即半圆形支架的吊桥独踞于城河两岸，城上的高楼飞似相环卫隆起，这么雄伟壮观的城池。(以上引文，府县志所载的于慎碑文与他的《谷城

山馆文集》收录的文字存有差异，参照引录。)

比较洪武五年建城记载，这次重修有五处显著变化：一是暗门，潜洞没有了，增加了郭；二是四门名称变了；三是修了二千七百多垛口；四是有了护城堤；五是修建了五处护城神祠。其他城池格局和设置仅楼橹、更庐数量稍有变化，其他基本相同。

其中所谓“閼门”“潜洞”，即暗门、隐蔽的门、隐藏的洞。古城改造时发掘出的地道，可能就是那时的“潜洞”。附城为郭，“城”指内城墙，“郭”指外城墙。而东昌府城没有外城的记述和痕迹，护城河外的堤坝好似外城，或是城门外所附的瓮城视为郭。

瓮城是内城门外筑的小城，瓮城门为外城门，东、西、南向南，南门向东，北门向北。瓮城门外是护城河。“各为水门”，“钓桥横跨水上”。水门，是瓮城外设的正对内城门的小门，而北门向东，出门面对钓桥，平时关闭，需要时开启。四门皆为拱券式门洞，门洞上建城楼。城楼飞檐翘角气势宏伟。特别是东门，歇山重檐，双重城楼，檐下悬明代内阁首辅、大学士朱延禧题写的“晖挹岱岱”匾额。意为城楼多出的光辉可增补岱岳。

城门门额变了，有人说门额是“城门灵魂”，好比这座城市徽章，是对这座城市内在文明的概括和标榜。

原四门门额：东春熙，西清远，南正德，北宣威。总的意思是说东昌古城左临运河，春风和煦，煦煦攘攘，一派繁荣；右边是一望无垠的田野、村庄，无限清明幽远。地方官员须崇尚修身正德，善政养民；凭借城池宣威扬武，感化敌人，保护人民。这应该是在明朝政权初定时对古城的切实描述。

后改的四门门额：“东曰寅宾，南曰南薰，西曰纳日，北曰锁钥。”大致含义是：迎着堪解民忧的煦煦南风，背靠可保民安的坚固城池，东迎日出，西送日落，百姓勤劳耕作换得丰硕收获。概括出明朝政权巩固后，这座城市百姓单纯简朴的生活景象。

宣统版聊城县志是最后记述这座城池的史书，它的记载与万历时记载的格局基本相同，可以说城虽经多次重修，经历539年，城池的格局没有大的变化，此后不再重修。

按今制大体匡算，城墙地上高11.5米，地下深6.6米，底宽9.9米，顶宽6.6米，除去垛口墙还应有5米多，可供十士卒、或五骑士、或两辆大车并行。

城墙墙体是用三合土约20厘米一层，层层夯实筑起。传说三合土是用糯米浆调制，既坚硬又有韧性。后来拆城墙落到护城河内的三合土层，在水内浸泡数年不坏，砍凿如石硬，撞击比石韧。三合土层外、底部以条石、中上部以临清皇家用砖技术烧制的24公斤大砖镶嵌，顶面由三四层大砖铺盖，非常坚固。

城门和四角有突出墙外的角台，城墙角楼至城门楼间各建一个墩台，备架火炮和射击兵临城下之敌。城角、城门和炮台处城墙内侧有守城将士、车马登城坡道。城墙顶部每隔约50米设有流水槽，备排城墙顶部雨水。城墙较城中央地平低约1米，全城水流往四周，城内四角都有蓄水坑，水多坑满有铁栅暗洞排入护城河。

城由水隔断与城外通道，设置可拉起的吊桥，如遇敌侵就拉起吊桥断绝敌之通道，在古代作战条件下，就能有力地阻止敌人攻城略地。敌人即使过了护城河，还有瓮城一道防线，若攻入瓮城，就会受到盖天而来的四面射击，无藏身之地，如同“瓮中捉鳖”。

于慎行在“重修碑”文中所说城上“建庙祠五”大约就是聊城最大的关帝庙，始建于元代，这次建于西城谯门之右，城上城下分两组；北门上的元帝庙；东门上的二郎神庙；南门上的财神庙；城墙东南角楼为魁星楼。

1946年元旦夜，八路军围攻聊城，多次强攻登城和重炮轰击，因城高城固均未攻克。围困一

年，1946年12月31日夜，在济南援兵的接应下，敌弃城而逃。1947年聊城解放后，为防敌人万一再攻打困难，调动十几县的民工将城楼、城门、城墙等拆除。现今高龄的老聊城人还都记得拆前的大体状况：城周环水，水外是护城堤，水内岸是城墙，四门外都有瓮城，为双层城墙。1936年范筑先来聊任聊城专员兼县长，为通行方便，将东门外瓮城新开为直通东关大街的门。门外有桥通四关。城墙拆除后，基础保存完好，为后来的修复提供了方便。

常说的城隍、城池，隍，即护城壕；池，即护城河。护城河是修城、筑堤、城内建筑用土从城周挖掘而成。历代记述或许所测季节不同，池深广略有差异。宣统间是“池深二十尺，广加十尺，阔倍之三。护城堤延亘二十里。”也就是说城河水深是6.6米，宽3.3米，最宽处达33米。从旧时遗存来看，在馆驿街南头有涵洞将运河水引入丁家坑，经旧米市街桥涵注入护城河，保持了城河常年不涸。

护城堤，是万历年间的莫与齐所建，延亘10千米。嘉庆年间，蒋尚思撰《重修聊城护城堤记略》说，堤长二千零二十三丈、高一丈、堤角横量六丈、面宽二丈。也就是堤长约7000米，堤高3.3米，堤底宽近19.8米，顶宽6.6米，好似缩小了保护范围。20世纪50年代中期，护城堤北起北坝运河岸，应是当时堤坝原址。1956年前后，每遇汛洪，机关事业单位即全力以赴筑堤防洪。后来相继对周公河、徒骇河、马颊河、漳卫河进行治理，水患排除，才渐渐废掉堤坝。

堤内的护城河经多年市民挖土脱坯出售，多次挖河泥做肥料支援农业，改革开放后修京九铁路、邯济铁路、高速公路、挖土筑路基，遂形成4.2平方公里水面的风光秀丽的东昌湖。

